

新形势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问题研究

王昭懿 赵 舒

(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3; 法库县人民检察院 辽宁 法库 110499)

摘 要:近年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走进了司法工作的视线中,各级司法机关及时将其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在实施宽严相济的过程中也不断作出优化、突破实务上的局限。本文主要围绕宽严相济政策中的“宽”和“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多种层面,具体通过何种思维、哪类措施,起到了哪种效果、又受到了哪些限制等方面展开来写;对于全国各地司法机关以及法律工作者在运用这一政策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相应的提出了解决建议。将宽严相济政策的真正设立理念完满的落实到法律工作中,是鼓励中国法治进步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宽严相济;司法机关;法律工作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iminal polic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ang Zhaoyi Zhao Shu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aw school; Shenyang, Liaoning;110003;Faku County People's Procuratorate; Faku Liaoning;110499)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has entered the sight of judicial work, and judicial organs at all levels have implemented it in specific work in a timely manner, and have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broken through practical limit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aspects and levels of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in the leniency policy, what kind of thinking, what kind of measures, what kind of effect, and what restrictions.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olicy by judicial authorities and legal practition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solve them accordingly. Completely implementing the true concept of combining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into legal work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encourage the progress of China's rule of law.

Keywords: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Judiciary; legal work

2020年,最高检在《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中表明,在侦查环节中建议适用该制度从2019年1月的23.6%上升到今年8月的35.5%。同时,主动做好诉审衔接,从法院视角审视该政策的实行,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的占97.3%。^[1]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在该制度的使用上起到了摆渡作用、提升了办理质效,彰显刑事司法的硬度与温度。

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减少了13个非暴力型经济犯罪的死刑,在取消死刑后通过加强惩戒力度、限制优待政策等方式,达到对于罪犯最终的惩治与教育目的;针对特殊罪名采用格外严厉的法律措施,例如严厉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严重有损国家形象的犯罪行为,体现出司法刚性与法律对特定罪名的强硬打击力度。宽与严相结合,打击与分化并举,特别强调“以宽济严”,从而形成宽严的良性互动,保持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协调与平衡。^[2]

一、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三大方向”

(一)对重点罪名严格把控从严标准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引发,其中明确指出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既然犯罪有重、轻、微之分,犯罪治理就应该在共性基础上有所区别。^[3]“从严”不仅要根据犯罪事实及犯罪构成,还要考量犯罪形态。针对隐瞒犯罪所得、案发后毁灭证据等犯罪行为,要从严处分、从重处理,以达到预防犯罪发生、遏制犯罪持续发生的目的和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央政法会议的讲话中要求,“深

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4]无论在刑事司法上还是刑事执行上,都要精准理解和深入贯彻政策内容,在“严”这方面仍体现刑事司法的及时性和严肃性。

(二)加强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成效

“从宽”作为一把标尺,不仅体现在实体从宽,还体现在程序从宽,还要通过犯罪分子的悔罪态度、认罪表现、是否符合法定的从轻情节来衡量从宽的幅度。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各地检察机关适用比例递升,从效果上看,不但缓冲了被追诉人对于社会造成的矛盾冲突,还能协助被害人取得相应的经济补偿,促使双方达成谅解或和解,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让被追诉人早日重返社会,帮助社会关系的修复与稳定。

(三)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以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为背景板,将贯穿于逮捕、起诉、羁押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在日后的落实工作中,要强调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律师的配合与协调,将该政策系统化、常态化,定时推行少捕慎诉慎押指导案例来帮助全国各地法律共同体理解和处理司法工作,实现该政策深入有效落实的愿景。

二、宽严相济政策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宽”和“严”标准不统一,缺乏严密性与具体性

由于最高法、最高检尚未给出具体的执行策略与运行法规,即便各地司法部门出台过适用于地方的政策法规,不免还是会出现缺乏统一、“各自为政”的情况,伴随而来的就是被追诉人同案不同罚、

各地检察机关量刑标准难统一、各地审判机关判罚标准参差不齐的不良结果。因总体政策上十分宏观,政策内容饱含原则性和模糊性,让各地司法机关难以把握政策运行于法律实务中的尺度。

当多地司法机关办理的第一桩案件不具严密、统一的贯彻政策,后续多桩案件将以此为“标杆”,辩护律师也会根据法院此前作出的“不具体”判决作为辩护意见,使下一步法律决定陷入两难,还伴随着失去司法公信力的危险。法律工作者缺乏这一政策制度章程的约束,将手中职权过于主观的运用,反而会积累冤假错案的发生,“返工”的几率增加,易形成“事倍功半”的不良倾向。

(二) 公检法考评制度不同,落实政策不畅通

公安机关作为法律工作的起点单位,侦查阶段的工作执行直接影响后续工作的开展。近年来,侦查阶段的羁押率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对部分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险性不大的犯罪分子没有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况。在办案过程中过于依赖数字考评指标,忽略了宽严相济政策的深层内涵。检察机关的考评机制与公安机关存在冲突,这导致二者交接过程中对于案件存在多角度的不同观点。

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不起诉率考评制度,导致检察人员办案时对于酌定不起诉案件很难决定,在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法律工作者掺杂着部分案件之外的主观影响因素,涉及各机关及各人利益,不外乎为这一政策的有效执行设下了重重障碍。侦、诉、审三阶段流水式工作安排,应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审判阶段在法律工作收官之余,更要审查前两阶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三) 对“从宽”和“从严”案件办理缺乏后续监督

无论是符合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作出从宽处理的案件,还是犯罪情节恶劣、属于国家严厉打击的部分犯罪从严处理的案件,都需要法律相关部门进行后续的监督与核查,以便案件达到最公正、最准确的处理。对于一项政策的贯彻,是准确还是滥用,是体系化还是畸形化,都需要相关部门后续的抽查和审理,有错必纠、逐步形成规划。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间人,也承担着将量刑建议与案件事实融合于宽严相济政策的重要角色,要加强对于侦查办案阶段的法律适用监督,若有适用错误,应及时止损。

三、针对实务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一) 建立严格统一的政策运行制度

若要全面科学的将宽严相济政策落实到法律实务中去,就要有一套严格统一的政策运行制度,帮助法律工作者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想要在司法实践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脱离司法程序后对社会起到的影响和政策效力的延伸。

完善这一政策统一运行制度,建议从三方面来进行:首先,从立法上,建议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进一步说明政策参考适用细则和重点适用情节,必要时列明指导案例供各地司法机关重点参考,使其处理案件时有据可依;其次,从量刑上,要严格遵从法定的量刑情节,量刑的幅度要通过不同案件的具体情节进行划分和解释。最后,在程序上,从起初的侦查阶段开始就要严格根据犯罪具体事实将案件繁简分流、依法处理,共同犯罪的要根据事实分层处置。建议后一阶段的司法机关要对前一阶段司法机关对于政策使用上的规范性进行巩固审查,以保证政策使用不畸形、对判决的正确性多份保障。

(二) 加强侦、诉、审三方面优化衔接,促进三方良性互动

公、检、法三方机关要在坚持分工不同、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的前提之下,还要格外注意三方在各司法政策背景下的衔接情况。对于现有的相关考评制度,建议作出相应的调整 and 改变,例如过于追求重视拘捕指标、不起诉率、抗诉率等数字指标,要根据社会的进步和政策的下达作出相应改革,帮助协调三方的工作配合。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于轻微犯罪的刑事案件,可以不予立案或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既保障当事人的人权,还可以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逐步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对于可诉可不诉的情形,优先考虑暂缓起诉的决定,在考验期限内根据其悔罪表现决定是否起诉。^[5]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要与其建立及时的案件沟通,以便在量刑建议上的阐述更具说服力、时效性。

(三) 实施政策全程监督,保证各机关合理运行

政策是宏观的,案件本身是具体的,立法的阶段性与滞后性会逐渐施予法律工作者以过量的“自由”。因此,为政策能够有效的实行,对于政策实施过程需要严密的监督。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对公安机关在受案办理中监督其避免不相关人员干预司法,对于社会影响力较大、挑战公序良俗的案件,在变更强制措施方面要予以加强监督;加强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配合工作,对人民法院在量刑上尽可能的细化量刑建议。同时,在审委会讨论案件的阶段,检察长的参与程度对于整个列席制度的性质以及功能定位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6]

另外,保证律师在诉讼环节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确保其在司法活动中的辩护地位,让律师的作用在案件中充分发挥,公权力机关对于宽严相济政策的适用与不适用决定,都要允许律师的询问与监督;履行强有力的监督工作,既保证了各方的法律地位与诉讼权利,宽严相济政策也可得到有效的发挥与落实,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法治社会进一步建设,体现社会政策对于司法的助力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2020年10月1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J].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06):1-7.

[2] 王光明,武景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恐怖犯罪立法中的贯彻及完善[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01):82-89.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11.

[3] 卢建平. 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J]. 政治与法律,2022(01):51-66. DOI:10.15984/j.cnki.1005-9512.2022.01.008.

[4]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深入做好新时代政法各项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J]. 公安教育,2019(02):1.

[5] 廖盛平. 浅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J]. 大陆桥视野,2020(05):79-83.

[6] 王鑫秋. 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证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0. DOI:10.27422/d.cnki.gxzf.2020.001369.

作者简介:王昭懿(1999.03-),女,满族,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律硕士,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非全日制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赵舒(1985.04-),女,汉族,辽宁法库人,中文大学本科,法库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研究方向:刑事监察实务